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

80周年特刊(二)



一张抗战老照片探秘

□ 本报记者 台建林
□ 本报见习记者 张运恒

这是一张抗战老照片。焦土废墟中，6名八路军指战员或立或坐，面容虽然模糊，但仍能感受到他们眉宇间的坚毅和英气。照片里有块硕大的“夕阳台阵地构筑纪念”牌子。

“夕阳台”阵地在哪里？照片拍摄于哪次战斗？6名八路军指战员是谁？多本正式出版书籍中，这张老照片都以不同的解读出现。

2020年4月，张谷林开始探寻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，“夕阳台”阵地的面纱，被一层层拨开。

寻找“夕阳台”

73岁的张谷林，是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会员，著有《论中华魂与根文化》《天路开基人》等书。

太行分会中，大多是八路军129师将士后人，也有当地抗战烈士后代。

“寻找‘夕阳台’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张谷林说。

张谷林和几个会员查阅各种军事书籍，均未找到“夕阳台”相关的战斗、战场和阵地。

在安徽大蜀山山顶，他们找到一座与“夕阳台”有着类似尖状顶部的“大蜀山阵地构筑纪念塔”，落款“昭和十五年”(1940年)，是侵华日军修建的工事。

回到“夕阳台”老照片，张谷林认为阵地上墙体的厚度、射击孔的设置，仍能看出精心构筑的痕迹。大家确定“阵地是日军所立”。

照片拍摄于哪次战斗？太行分会会员们群策群力，从不同版本的出版物中找到了这张照片。

——《李达画传》(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)备注“收复日军占领的陵川、晋城、和顺等4座城市”；

——《八路军图片》(解放军出版社出版)备注“辽县战役后”；

这几座县城，都是八路军129师在1945年春季攻势中解放的，搜索范围进一步缩小。但照片拍摄地在几个县城似乎都有可能。

“这是关键突破口！”大家一致认定，这张照片就是1945年4月解放山西辽县(今左权县)县城，高帆跟随一线部队拍摄的战场照片。

拍摄地点是县城哪里？张谷林向太行分会中的左权县先烈后代张先荷、董天祥、张宏伟等同志请教探讨。



八路军指战员在被摧毁的日寇“夕阳台”阵地前合影。

张谷林 供图

“夕阳台”老照片，图片说明为“辽县战役后前左1李达、2滕代远等”。

《天下之脊》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之一高帆，正是129师的战地摄影记者。

“这是关键突破口！”大家一致认定，这张照片就是1945年4月解放山西辽县(今左权县)县城，高帆跟随一线部队拍摄的战场照片。

拍摄地点是县城哪里？张谷林向太行分会中的左权县先烈后代张先荷、董天祥、张宏伟等同志请教探讨。

张宏伟连磕巴儿都没打，说：“这个地方就是北火神庙，日军管这个阵地叫‘夕阳台’，我舅舅与60多位共产党员、乡亲们曾被关押在庙旁的监狱里，有幸被隐蔽战线救了出来。”

张先荷说，北火神庙在城正北方，地理位置是个土丘。因为离县城近，日本人修了炮台，可以俯瞰全城。

照片上的6名八路军指战员姓甚名谁？综合各方信息，目前能够确认5名，从左至右前4名依次是：李达(太行军区司令员)、郝汀(八路军前



今日祝融祠，就建在早已被摧毁的昔日日寇“夕阳台”阵地上。

张文军 摄

方总部参谋，晋冀鲁豫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)、滕代远(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)、何正文(太行六分区副司令员)、第5名待考，第6名是申伯纯(八路军129师情报处处长，兼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主任及太行军区情报站负责人)。

“夕阳台”被炸塌

拍摄于1945年的“夕阳台”照片背后，有着怎样的故事？

1939年7月到1945年4月，辽县县城被日军侵占。日军残暴，令人发指。作家赵树理在《辽县城又复活了》一文中，描述了日军暴行。

因为害怕八路军袭击，日军建立了一条条绞索般的封锁线，紧紧勒住了百姓的脖子。“他们在城周围四五里的山头上、城门上、城角上、城里关外各高地、当街上，处处修建碉堡和地道”，对当地民众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残酷的镇压。县城晚上禁止点灯，谁要点了一下火，就算“通匪”；老百姓吃不上盐，谁要悄悄买一点海盐，查着了也叫“通匪”。

日军特务头子清水利一杀人如麻。他以“通匪”等罪名，亲自指挥杀过六百多人。“活剥过人头，摘过人心”；把一个活人“一条腿绑到树上，一条腿绑到骡子身上”，用骡子把人撕成两块，叫“立劈”；把许多人埋到地里，脑袋露在上边，叫“戳葱”；用铁丝从左耳穿进去右耳穿出来挂在梁上”等等，更是平常事。

“直到收复县城之后的一礼拜内，一般老百姓们走过这个杀人场，还是不敢正眼看清水利一住的房子”，赵树理在文章中记载。

辽县位于山西省东部，太行山主脉西侧，地处晋、冀、豫三省交界，素有“晋冀豫锁钥，山西屏障”之称。1937年11月，八路军129师先遣队进驻辽县西河头村，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。1939年7月，日军占领辽县县城。日军“扫荡”战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反“扫荡”斗争，就是敌后战场展开的主要对抗形式。

1942年5月，日军调集重兵“扫荡”，同时秘密派出两个精锐连队，乔装深入太行腹地，发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后，调集重兵包围。1942年5月25日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麻田十字岭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，年仅37岁。1942年9月，为纪念在此殉国的左权，辽县易名为左权县。

1945年4月，八路军部署收复左权县城战斗。23日，朱德独立团在左权、辽西两县独立营及地方民兵的配合与支援下，将左权县城及文峰塔、五里墩、红都等据点分别围困。当天午夜，我军以山炮猛烈轰击县城。

同时，八路军隐蔽战线通过左权县上其至村“开明士绅”、村长刘存仁，与其上其至炮台伪警备队长赵积义等建立秘密关系，教育、争取和瓦解敌伪人员，在伪军中发展共产党员。1945年4月25日，刘存仁将组织起义计划秘密传达赵积义，促成伪军发动起义。6名驻守日本兵被打死5名，1名逃回县城。

七里店、盘城岭炮台的伪军也纷纷起义。左权县城的鬼子更加惊慌，缴了县城伪军枪械。午夜时分，鬼子出城突袭围城部队，与我军民激战至26日7时，敌死伤七十人，败退回城，后弃城而逃。

左权县城解放。

赵树理记载，“结果没等八路军，鬼子自己用炸药又把这六七年来的大工程炸塌了”。

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等指战员，就是在此战后日军“夕阳台”阵地的合影。

“祝融祠”新景

自古至今，左权流行民歌，曲调简短，易学易唱，当地百姓人人都会哼，有词就能唱。

80年前，八路军打下日军号称华北第一大炮台的红都炮台，百姓在左权民歌小调基础上，重新填词改编一首《红都炮台》，“红都呀炮台修理牢，四周围墙两丈多高。六月二十三，天明四点半，红都炮台完了蛋……”几天内唱遍了整个县城。

左权县退休老干部张基祥说，1945年，八路军攻打左权县城，就有当地艺人以吟唱表演作为掩护，出入敌人炮楼，摸清了炮楼里日伪军分布情况，并用歌声瓦解伪军士气。

80年后，2025年春夏之交，站在新修建的“祝融祠”眺望，左权美景，尽收眼底。

“祝融祠”修建于当年北火神庙旧址上。北火神庙，曾经被侵略者构筑为阵地，称之“夕阳台”。

这一天，“祝融祠”前广场上，飘来一阵阵歌声，是我们熟悉的左权民歌，是“开花调”版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：“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。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，亲爱的朋友手挽手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……”

烽火铸法魂：抗战精神中的法治基因与时代传承

□ 陈光 赵硕民

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中国人民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，不仅以血肉之躯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，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。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回望，我们既要铭记先烈的伟大功勋，还应深入挖掘抗战精神中的多重基因，其中就包括法治基因，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将其守护好、传承好和发扬好。

星火燎原：抗战时期的法治实践奠基

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，积极推进人民司法，以法律形式保障民族平等和促进民族团结，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建构与重塑。在实现法治实践探索的同时也奠定了抗战胜利后法治建设的基础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权以1939年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》为总纲，在3年内颁布了327部法律法规，形成涵盖土地改革、刑事司法、财政税收的完整法律制度体系，构建起较为科学而系统的战时法制框架。晋察冀边区推行的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，将群众路线融入司法实践，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这些法治举措既遵循了基本法治原则，又充满着战时治理智慧。

1941年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》第十七条规定“尊重蒙、回民族之信仰、宗教、文化、风俗、习惯，并扶助其文化发展”，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民族平等原则。边区政府据此制定《陕

甘宁边区选举条例》，赋予少数民族选举权。以法律形式消除“大汉族主义”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彰显了法治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双向塑造。

从《开罗宣言》到《波茨坦公告》，中国政府始终注重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利益。1945年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在《联合国宪章》的签署，标志着中国首次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国际规则的建构。至此，中国人不再是现代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，而成为现代主权平等和国际正义原则的主动塑造者与维护者。

烽火淬炼：抗战精神的法治基因解码

现代法治由一系列价值理念和规则机制所构成。抗战时期的法治实践中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逐渐构筑了以规则意识、程序民主和权利文明等为内核的法治基因，而这些法治基因已经突破了战时法治影响，有着穿越时空的恒久意义。

对比从红军早期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以“说话和气”“买卖公平”等具有口头性与模糊性为主的伦理训导，到1942年《八路军军法条例》的24条成文规范颁布，党的纪律体系经历了从“道德律令”向“法律规范”的形式质变，完成从军事纪律向法律原则的理念升华。这种规则意识突破了传统“礼法合一”的道德伦理约束，通过“一般性”“公开性”“可预期性”等法治原则，将道德自律和纪律约束转化为立法法律；通过成文法明确权利义务关系，为战时社会交往提供了稳定的行为预期。

陕甘宁边区推行的参议会和选举制度，将

“豆选法”“香头烧洞法”等乡土智慧升华为程序民主。这种程序通过物质载体(豆子、香头)实现了秘密投票的实质功能，堪称“草根民主”的经典范本，内含匿名性保障、平等性实现和参与性提升三重法治意涵。边区民主实践通过程序创新破解了传统社会与现代法治的张力，实现并保障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。这种以规则求共识、以程序保权益的斗争策略，仍是现代法治处理复杂矛盾的重要方法论。

当纳粹德国推行《纽伦堡法案》实施种族迫害时，1945年《中国解放区抗战时期处理战犯条例》规定“不得虐待俘虏”“保障战俘基本生活需求”，对战争的物质保障、医疗救济及申诉机制等人道主义待遇标准，与同期《日内瓦公约》形成价值共鸣。这表明即便在战争极端环境下，法治依然可以守护人性底线和保障基本人权，而这也正是现代法治最硬的内核和最强的基因。

薪火相传：抗战法治基因的当代价值

由于价值理念的文明性和机制举措的合理性，战时法治不仅产生了特殊状态下的应急之效，而且其内核基因对当前及今后中国法治建设依然有着重要意义。

抗战时期“原则坚定、策略灵活”的“特别立法”逻辑以及战时分田减租、劳资调解等政策中所展现的辩证思维，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，尤其可以为当代应急法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。2025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中“比例原则”的适用，在1942年《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》确立的“必要限度原则”中可以找到制度承袭的脉络。1943年《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》确立的“精

简、统一、效能”原则，与当代行政法的“效能原则”形成某种历史对话。

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强调调查研究、巡回审理和调解优先等理念，创造性地将民间调解、群众评议纳入司法程序，形成独具特色的“东方经验”，这与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和“多元解纷机制”等形成历史呼应。近年来法治本土化探索也继承并发展了抗战时期司法为民的传统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的“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”建设和建立的移动微法院与线上调解平台，2023年至2024年连续两年实现全国法院诉前调解成功案件突破1200万件，这些正是司法为民传统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性发展，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了“送法上门”传统的空间拓展。

近年来，面对单边主义抬头和“长臂管辖”等新型霸权，中国政府坚持通过国际法院诉讼、国际仲裁和多边协商机制等法治途径来积极应对。RCEP协议中“发展权例外条款”的设置，与1943年废除不平等条约时的“渐进策略”具有相同的方法论属性——在承认规则普遍性的同时坚守国家利益底线。

当法治之光穿透历史的烽烟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幅气吞山河的战争画卷，更是一部淬炼民族魂魄的法治文明锻造史。在苦难中觉醒，在斗争中成长。党领导的法治实践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铸就了中华法治的精神魂魄，是民族复兴的“稳定之锚”与“动力之源”。这些深植于抗战烽火中的法治基因，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种，穿越八十载时空，依然在新时代表面依法治国的征程中迸发着澎湃伟力。

(作者陈光系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，赵硕民系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)

编后

记忆依然滚烫

□ 台建林

参与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选题策划的日子里，总想起老家汾南一所小学的那个老校工。

校工后脑勺有道伤疤，自脖颈起，蜿蜒到头顶。巨型伤疤让我们一众学生惊恐，甚至做过噩梦。校工“跑日本”时，躲到一棵柿子树上，但还是被鬼子发现，驱赶他下树，用刺刀戳他的头顶。

他死里逃生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以为很多事情已经忘却。殊不知“抗战”两个字映入眼帘且能够为纪念抗战胜利做点事情的时候，那道伤疤就又浮现眼前了。记忆依然滚烫。

我们的记者同事、学者的稿件纷至沓来，一字一句间，我们看到，黄河在怒号，雪橇在冬日林海飞驰，战船在白洋淀穿梭，神枪手在青纱帐出没，领袖在窑洞运筹……铁血与柔情，家国与民族，战争与和平，乃至中国式现代化，再也不是——一堆抽象概念，尽皆鲜活起来。

这一期，我们依例推出一篇纪实稿件和一篇理论文章。

这一刻，报纸即将付印。“夕阳台”老照片上的八路军将士，在当年战地记者按下相机快门之后，仿佛站立起来，拂去衣襟上的尘土。他们的脚下，是日寇精心构筑的阵地，已被炸得稀巴烂。硝烟深处，他们微笑着，向80年后的我们微微挥手，似乎要叮嘱些什么。

不由眼眶湿润，小心翼翼地，在键盘敲下本期报道的最后一个字符。